

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 编印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属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许

多朋友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先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政协天津市河东区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组成人员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区政协九届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主任: 金之坚

副主任: 姚士馨 (聘请) 刘连元

叶文培 孙新源 李象泰

委员: 于淑芳 马耀錡 刘荣祺

孙经义 杜金娥 李可家

李植铭 孟庆山 赵显庭

高守天 袁家宾 崔嘉祥

韩培民 魏建国 曲振明 (聘请)

张树基 (聘请) 韩国平 (聘请)

缪志明 (聘请)

目 录

1. 李鸿章与天津机器局 葛培林 (1)
2. 王荷舫与开滦北方售煤处 刘 勃 (14)
3. 天津市胶鞋厂简史 刘长安 (29)
4. 天津牙粉、牙膏行业发展概况 李泽民 楊炳達 (32)
5. 鹤立鸡群的宝华成布店 姜汝绩 (45)
6. 玉生祥米面铺与玉生祥胡同 朱翰元 (53)
7. 天津市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 金之坚 (57)
8. 女书法家王千任教河东 韩国平 (61)
9. 河东区的妇女宫颈癌普查工作 杨志瑛 (64)
10. 贾家沽庄村考概略 何连起 (70)
11. 周公祠原始资料叙录 缪志明 (83)
12. 景色俱佳的第二工人文化宫 张树基 (100)
13. 河东区建筑景观的变迁 韩国平 (106)
14. 旧俄国花园与圣母帡幪堂 张绍祖 (112)
15. “理门公所”的内幕 衣 者 (114)
16. 河东脚行的始末 高立森 (127)
17. 黑旗队的骨干佟海山霸占 小白玉霜 徐 嵘 (138)
18. 高超技术高峰的钢第大王——冯国惠 安连发 (144)

19. 方药雨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曲振明 (154)

20. 解放天津时的东局子战斗 陈德仁 (161)

21. 河东区人民法院建院初期的回顾 何连起 (164)

22. 街道简介

一、中山门街 (56)

二、大直沽街 (69)

三、广宁路街 (82)

李鸿章与天津机器局

葛 培 林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它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先后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当时天津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首领，在天津创办了不少洋务事业，如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和电报、武备、水师、医学等近代学堂。而天津机器局，则是李鸿章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后接办的第一个洋务运动时期在天津兴办的军事工业。

天津机器局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崇厚主持的初创时期（1867—1870年11月）；二是由李鸿章主持的发展和毁灭时期（1870年11月—1900年）。本文所要谈的是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后的情况。

一、初创时基本情况

天津机器局分西局和东局。西局座落在旧城南海光寺（今和平区南京路二号）。东局座落在河东贾家沽道（今解放军工程运输学院）。

东局是机器局的主要生产单位。其占地面积与生产规模均比西局大。东局有旧河沟一道，淤塞不通，遂先将河沟开宽加深以通船只，便于运送物料。局基东西长为390丈，南

北宽250丈。另外，在局南勘定地基两块，一块长130丈，宽17丈，作为建盖洋匠住房之用。一块为设立砖瓦窑厂之用。又在局北勘定地基一块，作为设立公所之用。共计买民地22顷30亩。自1867年秋购料，转年春，按外洋送到的局房图式，兴工建造。局内共建机器房42座，计290间；大烟筒10座；洋匠住房160间。夏季，该局购买的机器运到东局，有造火药器4台；造铜帽机器1台；铁木各匠机器1台，淋硝、淋磺、研药、筛光药等配带齐全。所雇洋匠也先后到局，各机器业已安设完竣。

西局另饬洋匠在上海等处买机轮1台、铁炉2台、旋床2台，以备东局机器随时添配物件、零星家具之用。

天津机器局自1867年5月开局起，至1870年8月底止，建局告成，耗资巨大。清廷拨银48万5333两3钱3分。其中，东局支用银38万8178两8钱8分2厘；西局支用银9万5795两9钱3分。两局共支用银48万3974两8钱1分2厘。尚余银1350余两。^①由此可知，在东局所投资金是西局的3倍多，说明建设的重点是东局。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决定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前往法国“赔罪道歉”。清廷遂将天津机器局委李鸿章接办。

二、接办、扩充和整顿

崇厚在出使法国前夕，曾上奏清廷，清饬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崇厚在奏折中指出：“直隶总督李鸿章向能筹维大局，于制器之道，历经考据精详。此局之设，因系初办，未敢铺张，较之福建、江苏等局，用款甚少。奴才崇厚现在

出差，以后应如何斟酌添制开展之处，请饬下李鸿章妥筹酌办，以期一劳永逸。”②1870年11月4日，清廷给李鸿章的谕旨指出：“崇厚现在出差，应如何斟酌添制开拓之处，著交李鸿章妥为筹画，奏明办理。该督于此事讲求有素，务当督饬津局委员，事事悉心研究，务将此中机巧，竟委穷源，庶可有裨实用，不至徒托空言。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③这样，处在初创时期的天津机器局遂交李鸿章主持。

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后，为了加强其准军实力，以“北方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为理由，积极整顿和扩充天津机器局。

首先，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的大事做了安排。他把自己的亲信、江南制造总局的督办沈保靖调津办理天津机器局，解除了洋总管密妥士的职位。据1870年11月18日，李鸿章上奏的《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指出：“总理衙门奏令崇厚在津购买机器，设局造药，足补南局所未备，且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极为远虑深谋。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又凡仿制洋器，每年所用工料银，较之每年所出之货，必比采买之价稍贵。即稍贵亦系值得，不为虚糜。崇厚奏称：“据密妥士云，再添研药机器三份，则所出火药可增三倍，较之采买即可节省”等语。臣昨亲往该局查看，面询密妥士，又不敢据为成说。盖其夸大之词也。惟该局规模初具，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当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逐事核实。非廉政熟悉而有条理之员，不足与谋。”④由此可见，李鸿章的言外之意，指密妥士靠不住，是个说大话不办实事的人。而要办好该局，非找一位

“廉政熟悉而有条理之员”不可。然后，李鸿章笔锋一转指出：“湖北补用道沈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各洋商评定收货给银，务取该国发货洋文单为凭。委员各有专司，其冗食不究心者汰去之。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无稍冒混。沪局开设数年，已造成轮船四只。洋枪、大小开花炮、洋火箭等项，接济各军，应用者均不下数千件。出货较多，而用款并不甚费，以视闽局专任税务司法人目意格，津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似稍胜之。”^⑤李鸿章用沪局和津局相比较，意在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在用人上，应用中国官员总理天津机器局，以免洋人把持。

第二，在花钱购物上，买机器设备要自己选择，收货付款，以发货单为凭，做到少花钱、多办事，避免盲目购货。

第三，将多余无用之员淘汰。

对比之下，崇厚经办津局时，则以洋人为总管；买机器设备也由洋人自主，在管理与生产方面也逊于沪局。

李鸿章的“绕弯弯”之法，目的是要把沈保靖“绕进津局，把密妥士‘绕’出津局。正如李鸿章在奏折中所言：“沈保靖与臣交近三十年，坚明耐苦，丝毫不欺不苟，实所深信。可否请旨饬令该员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以资熟手。密妥士屡次来谒，臣谆谆告诫，以核实利用为要。该领事人尚和平要好，或可相与有成，容再察酌妥办，并一切整顿开拓章程，随时督饬沈保靖相机筹议具奏。”^⑥经李鸿章的一段时间对密妥士的“察酌妥办”的结果，决定撤去他在津局

的职位，任命沈保靖为津局总办。据李鸿章在1872年10月24日的奏折中指出：“臣遵即将该局事务悉妥筹，酌量开拓，饬委湖北补用道沈保靖总理其事，并委津海关道陈钦会同经理。该道员等接办以来，加意研求，配制洋火药铜帽、添造机器、炮弹、炮架等件，均属精利适用；增建厂房，添购碾器，兴造药库，加筑围墙，亦经次第规画，驾驭中外匠役，实心实力，处置裕如，整顿一切，具有条理，可冀渐收成效。总管洋官密妥士，于机器未甚精核，亦即因病撤差，另募熟手接办。”⑦

三、扩充设备，扩大生产

李鸿章接办津局两年来，顺利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撤了洋总管密妥士的差职，一部分无能洋匠也被辞退。对此，当时的《捷报》曾评论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以后，就任命了大批的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机器局则将完全由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依靠李鸿章了。”⑧因为李鸿章深知清廷创办津局的目的在于“防患固本”。这一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加强国防力量，二是为了牵制和防范象他这样的汉人实力派。这使李鸿章感到：要常保高官厚禄，不培植亲信，不扩大军事实力是不行的。

其次，李鸿章为了扩大天津机器局，达到扩充军事实力的目的，有意向清廷宣扬洋枪洋炮的威力，以引起清廷对津局的重视。对此，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臣查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

则器必无成，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费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⑨

因此，津局得到扩充。1872年，在东局增建了铸铁、熟铁、锯木厂。1873年，添置药碾机器三台，续建了第二座碾药厂。1874年又建成了第三、第四座碾药厂。另“添员匠住房70余间，储料库房10余间。”⑩

天津机器局经过连年扩充，在李鸿章、沈保靖的主办下，道员吴赞诚、候补道刘汝翼，先后经营局务；与津海关道黎兆棠“商榷妥办，日起有功，就岁成军火而论，较前两年多至三、四倍，所有料物亦如之，而人工所增不及一倍，经费约增三分之一。以之应付直隶淮练军、关外增防各营及调援台湾、奉天之师，均能储备有余，取用不匮。”⑪该局所造的火药、铜帽、拉火、后膛枪炮子弹等，经淮军试验，与新洋式枪炮比较无异。所造水雷，在海口演试，应手立效。到1879年，该局添置了提磺厂、轧药器及分药等厂房。增建库房20余间。

东局还设有电报、水雷学堂。同时也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电引，布置水雷用的轮船及挖河船等。

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后有一定成果。现将1876年至1881年该局生产的军火数量统计如下：（见附表一）

从上述统计数来看，生产火药、铜帽及枪子是该局的突出特点。对此，李鸿章在1876年10月8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该局制造诸物，向以洋火药、铜帽为大宗。”⑫在产量上，火药、枪子、炮弹、各式拉火都在逐年增加。1882年之后虽然缺乏数字统计，但据1885年9月4日，李鸿章在奏折

中称：“光绪九年（1883年），该局承造洋枪药、炮药、饼药、铜帽、拉火、枪子、前后膛新式炮弹、碰雷、电箱、电线等项，均遵向章办理。前将机器购到，当即盖造新厂三十多间，另盖火药房以为造炮船号之用。”^⑬

1884年法军发动侵华战争，中法军队在马尾港交战时，天津机器局的产量比以往大增。对此，李鸿章说：“盖十年（1884）分值法兵构衅，屡次声言北犯，北洋海口林立，逐处戒严，拨用军火繁巨。其各省咨拨者亦较往年多至数倍，不得不倍数赶造，并添购大批物料，如铜、铁、铅、油漆、煤炭、木植等类，俾资接济。自七月间闻省马尾开仗，催造调拨益形严紧，各厂皆添做夜工。”^⑭1885年，该局仍添购物料，加做夜工，赶造军火，以期无误调拨。选募洋匠建盖厂房，扩大军火生产。1887年，该局又新建制造栗色火药厂，采用“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⑮以供应各海口炮台内新式后膛大炮和军舰炮位之需要。1889年，又添购大小车床16台。1893年该局生产的军火，“为水陆各军取给之源，各项火药、子弹等件既须供支常年操防之用，尤须预备意外不虞之需。”^⑯综合这些零散的记载，表明天津机器局制造新式军火的生产量，到1893年之前，一直是扩大的趋势。

四、清军军火总汇

天津机器局新式军火的大量生产，使清廷用洋枪洋炮武装了军队，从而代替了刀枪剑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延缓清朝专制统治灭亡的作用。

津局所生产的军火除供应直隶省各军、兵轮、炮船之

外，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皆按时拨济。河南等省需用的火药、铜帽，亦向津局调取。如1880年，“俄事骤起，边海两防同时吃紧，山海关、乐亭、牛庄、烟台等处均驻多营，吉林亦增劲旅，津局为洋军火总汇。外以给各军月操之用，内以备有事时攻剿之需，各路军营恃以无恐，洵于大局有裨。”^⑯其目的是挽救垂危的清王朝。清军的任务，对内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也会指向外国侵略者。如在中法和中日战争时期，在台湾和伊犁交涉紧张时期，津局立时添夜班，赶造军火，运往前线。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廷即使要维持现状，也必须在军事上有所防御。否则，面对列强勒索，将会无法应付。而且，明显地示弱于外，必将引起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加深清廷政权覆灭的危机。

五、奖励洋教习

津局雇用的洋匠，主要来自英国、德国、奥地利、丹麦、俄国。李鸿章就外国教习及高级技术人员在传授制造军火方面有突出成绩者，上奏清廷，赏给“顶戴”、“宝星”，以示奖励。对此，李鸿章在1881年9月24日、1891年4月5日、1893年5月20日，曾在奏折中指出：“洋教习英国人施爵尔，拟请给四品顶戴；洋教习英国人沙兰，拟请给五品顶戴”。“各国员弁商人在华著有劳绩，历经奏蒙给“宝星”以示奖励。德国克虏伯厂来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克虏伯厂制造总办克拿思、兼充荷兰国天津领事官奥国人满德等四员，于中国购造海防巨炮，并传授制造栗色火药秘法，均能实心经理，著有劳绩。电报教习丹国人克纶西、俄国商务参

议四达尔祚福、管驾利运轮船英国人摩顿等三员，历允各项差务，均能勤奋尽职。仰恳天恩，俯准将福合尔比照各国武职大员例，赏给二等第三宝星。燕格、克纶西比照陆路副将教习例，赏给三等第一宝星。克拿思、满德、四达尔祚福、摩顿比照水师管驾陆路参将、副领事官例，赏给三等第二宝星，籍资鼓励”。天津机器局创造栗色火药，延雇德国教习沙尔富，数年以来，于做栗色火药器料形色速率及涨力轻重，逐细教导，局中工徒渐能领会，颇著成效。各海口炮台内新式后膛大炮并铁舰、快船之巨炮，非用此药施放，不能及远制胜。该教习沙尔富悉心教授，俾海外秘法尽得其传，裨益军需非浅。合亟仰恳天恩，俯准将沙尔富赏给四品顶戴、三等第三宝星，以示鼓励”。^⑯

从李鸿章对洋教习的封官加冕来看，一方面说明天津机器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大，主要军工技术人员依靠英、德、奥、丹、俄等国。因为我国近代军事工业源于欧洲，当时该局在技术力量上依靠洋匠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在洋匠的指导下，确实生产了一批新式枪炮舰艇，为清廷培养了一批军事工业人材。因此，李鸿章奖励洋教习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洋匠的积极性，生产更多的新式军火，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

李鸿章为办好天津机器局，除依靠洋教习的技术外，还调集了一些热心洋务的官僚。他对“才具优长，吏治洋情，均称熟悉”者，也分别给以奖励。据初步统计，受李鸿章奖励的官员有86人。

李鸿章对僚属奖励的目的，一是为了培植亲信，发展淮军军事集团的势力。二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培养既

效忠清廷，又通晓洋务者，以起到镇压农民起义、应付外来侵略者的作用。

六、近代工业的开端

天津机器局的经费，主要来源是“津海、东海两关洋税四成银两”。^{②0}年约三十余万两。1880年后，随着生产的扩大，每年从户部西边防饷内拨支银一万两。1888年后，又从海军衙门拨支洋药厘金作为常年经费的补助。该局还收北洋海防经费款和各省订购的军火款项。

现将天津机器局从1867年至1892年（同治六年至光绪十八年）收海关库所拨银两数目列表如后：（见附表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尚缺1893年至1900年（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六年）拨银的数目。但假设这七年平均拨银35万两，该局从1867年创立至1900年被毁止，共用银达千万两。

这个耗资巨大的天津机器局，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中，遭到了烧毁。虽然如此，但它作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1）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军工人才，也为朝鲜培训了一些军工技术人员。1881年1月26日奕訢在奏折中指出：“兹以时事多艰，练兵尤为急务。臣等公同商酌，拟请援照从前办过成案，由臣营选派心灵手敏官兵三十员，就近赴天津专事学习外洋炸炮等项各种军火机器，以充备军实。且天津距京匪遥，拟令此项官兵分班前往学习，轮流更替，籍以转相传习，庶可多收才技之效。”^{②1}经过培训的人员，成为清军的骨干力量。另外，该局为了代培朝鲜军工人，在东局专门建了一处朝鲜馆，一处习艺厂，专门培训朝鲜军工技

附表一

年 代 别	军 火 名 称	火 药 (磅)	钢 弹 (辆)	各式枪子 (辆)	前膛开花		后膛铁铅		各式抗火		炮架车旋		林明教中		大小水雷		隔炉洋床	
					炮 弹 (个)	采福炮弹 (个)	采福炮弹 (个)	各式抗火 (枝)	机 器 (磅)									
1878年 (光緒二年)	643000	42000000	948000	68000	2000	174000	40											
1877年 (光緒二年)	58000	35000000	1000000	58000	4000	187060	20	200								500		
1878年 (光緒四年)	565035	38990000	1376000	63942	5444	148120										46	77	
1879年 (光緒五年)	651083	28350000	2450200	66574	9661	213055										149	40	
1880年 (光緒六年)	645350	25270000	2545400	35430	7870	162300	80									352		
1881年 (光緒七年)	1039830	30756000	3938400	21680	5792		70									299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四，第253页至267页。